

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,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和目标:“有教无类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第十五》)那就是说,不管出身如何,高贵还是贫贱,或是智力有低下,聪慧还是愚笨,都可以而且应该接受教育,同时会在教育中有所提高、有所改变。后来的人,就把“有教无类”和“因材施教”称作是孔子的两大教育思想和方针。对此,孔子以后不久的荀子就说过:“和之璧,井之厥,玉人琢之,为天子宝。子贡、季路,故鄙人也,被文学、服礼仪,为天下烈士。”(《荀子·大略》)也因为这样,孔子有闻名天下的弟子三千、七十二贤人。

孔子的巨大影响就在于,中国后来的教育史,基本上走的就是“有教无类”的道路。

但是,现在的事情却有些麻烦了。有一家教育机构,把有学习问题的学生竟然分为十类:目标缺乏型、不能坚持型、习惯不良型、信心不足型、偏科拉分型、死记硬背型、基础薄弱型、思维偏慢型、心理叛逆型、厌学放弃型。我真想叫一声“天哪——”,这是别出心裁、一网打尽,还是故弄玄虚、耸人听闻?

在天高地远的田野里,无论挥汗劳动,还是很无聊地望着野眼,心里总会惦记镇上的海棠糕。

海棠糕师傅是跛脚,衣服也总是油里吧唧的,但是,他做的海棠糕,却是当地一大美食。他原是村小民办教师,因多年不得转正,工资又低,顽劣学生还骂他跛子,他就不干了,借钱在镇上开了一家海棠糕店。他有文化,又肯学,还专门到苏州去学过海棠糕做法,因此,他的海棠糕味道就很正宗,还做出了名气。无论男女老少,上镇都要在他那里买一两块海棠糕吃,好像不吃这点心,就像没有上过镇一样。

我第一次去买海棠糕,心里就被震撼了一下。走到他那个破败的店面前,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海棠糕,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。她站在跛脚师傅一侧,就像老榆树旁边开着一株艳海棠。她在砧板上切着板油丁,红唇白齿,跟跛脚师傅有说有笑。旁人说,这就是跛脚师傅的女人。师傅靠做海棠糕殷实起来,还在乡下盖了房,这漂亮女子,就是他新近娶的。

想来有这女子相帮,师傅才今非昔比了。他两颊有了光,手脚更麻利了,生意也越做越好。以前海棠糕从模子里倒出,要在铁板上搁很久才卖得掉,现在却随做随卖,还得排队;原来他用的是6孔糕模(一周5孔,加中间一孔),现在扩成了8孔,远看上去还真有海棠的模样;原来糕芯豆沙放得很少,只有蚕豆大小那么丁点,现在却放一满匙,糕肚子弄得鼓鼓的,咬一口豆沙就溢出来,令人烫了嘴还叫好;原来糕皮外面只有焦黑的一层馅糖,现在增加了蜜钱丝,甜得五颜六色;糕模里的糖水油料也足了,火头一旺,边口的糖水油就吱吱冒泡。我们这些排队的,想看的就是这糖水油泡,可也最看不得这糖水油泡,因为这泡一冒出来,就香气四溢,香得我两脚发软,香得人要晕过去。我们闻着这香,看师傅,又看女人,心里都想,这海棠糕上的花头,十有八九是她想出来的……

这夫妻俩,后来还带上全套家伙,被办喜事的人家请到乡下,为“三日酒”定做海棠糕。可以说,这是老镇海棠糕的顶峰之作。

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至今已有一甲子了。我虽然只有两年多的馆龄,与文史馆的关系却始于三十年前,因为我的母亲邓珂云曾经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批入馆的馆员。

母亲的一生平凡而坎坷。年轻时,她满怀一腔热血,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,跟随我父亲,成了一名当时并不多见的战地女记者。与父亲一起率先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。战时生下我和弟妹后,为了让父亲继续随军做好战时报道,她独自照料三个孩子,在日军的轰炸中带着我们颠沛流离,并挺过了在流行的传染疾病中失去小女儿的打击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,为支持父亲在海外从事祖国统一的工作,她又任在上海,忍辱负重,默默接受了二十二年夫妻两地分离的生活,挑起了照顾我的祖母和外公外婆,并把我和两个弟弟培养成人的重担。母亲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冲击,苦难中,她

又失去了清华毕业的大儿子……

1978年,她成了文史馆馆员,她把这看成是一生的最高褒奖,是国家对她默默奉献的肯定。这以后,文史馆成了她最高兴去的地方,她积极参加馆里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,结交了很多好朋友,她不再觉得孤独。在那些活动中留下的照片里,她脸上绽开的笑容是最由衷灿烂的。

母亲于1991年去世。没想到二十年后,我也成了一名文史馆馆员。母亲生前的好友,有的仍旧健在,我把他们当长辈一样地尊敬。很多馆里的工作人员,母亲在世时我就和他们熟悉,走进馆里,我像回到了家一样。

文史馆汇聚了文化界方方面面的人才,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化界的前辈。走进文史馆,就像走进了一所新的学校。文史馆也是一个让我退休下来

面对还是幼儿、少儿,或者刚刚豆蔻年华、天真烂漫的中小学生学习成绩不太如意的,真有这么十种类型?且不说这些分类是否合理,其中,光是一个基础薄弱,大概就能概括许多,而目标缺乏和不能坚持,究竟又有多少区别?于是,一个有着“有教无类”光荣传统的中国教育,怎么就遭遇到“教而有类”的挑战?

## “教而有类”乎?

马以鑫

不能小觑这么一个教而有类,因为这足以吓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奶外公外婆。面对孩子学习成绩不如意,十种类型在前面,就会让人对号入座、惊悚恐惧。是呀是呀,就是呀,终于还是请君入瓮、自投罗网。世事不懂的孩子,也会被吓得一愣一愣,是呀,可不是呀,是第五种,还是第九种?这还可以美其名曰,叫做个性化、有针对性教育呢!果然,令人叫绝的是,既然分出了十种类型,那么,就有每一种类型的点穴妙方,什么“体能定力训导”、“心智成长引导”、“亲子关系疏导”,新名

前些日子,翻阅《云间语小录》好似清风扑面而来,在施蛰存先生笔下,故乡的山川人物、飞禽走兽、亭台楼阁无不生动有趣。施蛰存先生那颇具魏晋风致的手书飘逸典雅,很是令人神往,而忽然想起施蛰存先生1988年曾经寄过一张精美的贺卡给我。翻找多时,终于从故纸堆中搜寻了出来。那是施蛰存先生为纪念女画家陈小翠逝世二十周年用她《寒林图》清香天采楼印制的。成排稀疏的树木,内置两间草屋,有一人独自伫立在屋前,背后是起伏的山峦,泛黄的底色透着古色古香的味道,意境幽远。画的左上角是陈小翠自题诗:“落叶荒村急,寒星破屋明,不眠因酒薄,开户觅秋声。”诗画可谓珠联璧合。令我更加欣

喜的是,贺卡上有施蛰存先生用魏碑体毛笔书写的“奉贺 金石万福”。施蛰存先生对金石碑帖素有研究,尤其偏爱魏碑,读其所作《洛阳龙门山北碑造像记五十品集释》序可略知一二。此卡施蛰存先生落款铃印,系西冷名家韩登安治印,更显清婉雅致。

陈小翠擅诗词,画作清雅秀逸,书法有峭拔之趣,是海上知名女画家,上海中国画院画师,卒于“文革”。生前印有《翠楼吟草》十三卷。施蛰存先生在北山谈艺录“交芦归梦图记”一文云:“余少时尝与吾杭诗人陈媛小翠有夙咏联吟之雅,相知而未相见也,逾四十年,岁甲辰,人日大雪,始得登元龙之楼,披道韞之帷,晤言一室。”陈小翠曾应施蛰存先生之请拟作《西溪归隐

之图》相赠,怎奈天不随人意,画未成,人已去。施蛰存先生先凭吊陈小翠墓地说:“松楸既杳,碑碣不存,欲哭无泪,述哀无辞”之语。在他的《闲寂日记》中就有他拜访陈小翠谈诗论画的记载。后来知道施蛰存先生还先后用陈小翠和另一位女作家、画家赵清阁画印制成贺卡分赠好友,从中可感受到施蛰存先生极富生活情趣的另一面。

第一次见到施蛰存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还为此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。我是先去了华师大语言学家史存直教授家,门开的瞬间我就意识到我找错了门,施蛰存先生哪有那样长的胡须呀?好在史存直教授没有丝毫为难我就给了我施蛰存先生愚园路1018号住址。施蛰存先生和许杰、史存直三人曾一起由华师大召开祝贺执教六十年茶话会,同时退休并被聘为研究生导师。待见到施蛰存先生告知找错门一事,他大笑并对我说:“‘文革’期间,我被频繁地拉去批斗,后来才知道我大多是代替史存直的,因为小蒋们老是把我俩搞混了。”那次见面问他为何独独钟情翻译介绍东欧文学,施蛰存先生想了一下说:“我是受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的影响。东欧

文学的两个主旋律是农民问题和爱国主义,这正和中国当时的客观形势相一致。向国人广泛介绍东欧文学,就是要民众不做亡国奴,最终唤起全体民众抗日的决心。”以后他应我之请曾参加了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著作活动,分别捐了《北山集古录》和《花间新集》,有缘的是这两本书经公开拍卖最终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
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幸运,施蛰存先生还赠送我一页周作人为他法书的诗笺:“清逸先生百世师,通书读过愧无知。年来翻遍濂溪集,祇纸蓬窗夜雨诗。乙丑暮春写旧诗应施蛰存先生雅令 知堂。”从时间推算,诗笺系知堂老人出狱至上海,寓居横浜桥尤炳圻家时所写。周作人是施蛰存先生倾慕的文学前辈。1935年他为上海光明书局编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,曾专门周作人为封面题签。上世纪50年代,周作人遭人唾弃,落魄寂寞,施蛰存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与之书信往来,每赴京都亲往造访。对周作人、施蛰存先生在其《知堂遗述》短文中有如下评述:知堂老人的一生,是使人惋惜的,虽然在三十年代他和乃兄鲁迅的思想已南辕北辙,但他的人道主义和中庸主义,还是可以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。乃至附逆以后,身名大坏,使人有“脚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之感。可谓意味深长。

词一大堆,琳琅满目,不一而足。于是,还不乖乖掏钱,赶紧呀。

老实说,教育的一种大失误,就是用各种名堂给学生分类。一个小孩还在各方面的发展成长长期,很多东西都远未定型,现在,却有人这个那个这么分那么分,不要说是对孩子的现在,就是将来,也是极大的伤害。

我又想起了五百年前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留下的一句名言:“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,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,但是学生可以多学;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、厌恶和无益的劳苦,多具闲暇、快乐和坚实的进步……”(《大教学论》)联系实际,我觉得奇怪的是,我们好像很多方面都和这样的要求和期望完全相反。

麻烦的是,社会上有些人一直紧紧瞄准着教育这么一个市场,千方百计、冥思苦想的是要在学生和家長身上捞钱,以肥自己。瞧,不就有了这么一个“教而有类”登堂入室、堂而皇之地游走四方。

这样的招生广告,祸害可不是一点点。

记施蛰存先生

黄滨海

风景依稀似去年

先生用魏碑体毛笔书写的“奉贺 金石万福”。施蛰存先生对金石碑帖素有研究,尤其偏爱魏碑,读其所作《洛阳龙门山北碑造像记五十品集释》序可略知一二。此卡施蛰存先生落款铃印,系西冷名家韩登安治印,更显清婉雅致。

陈小翠擅诗词,画作清雅秀逸,书法有峭拔之趣,是海上知名女画家,上海中国画院画师,卒于“文革”。生前印有《翠楼吟草》十三卷。施蛰存先生在北山谈艺录“交芦归梦图记”一文云:“余少时尝与吾杭诗人陈媛小翠有夙咏联吟之雅,相知而未相见也,逾四十年,岁甲辰,人日大雪,始得登元龙之楼,披道韞之帷,晤言一室。”陈小翠曾应施蛰存先生之请拟作《西溪归隐

之图》相赠,怎奈天不随人意,画未成,人已去。施蛰存先生先凭吊陈小翠墓地说:“松楸既杳,碑碣不存,欲哭无泪,述哀无辞”之语。在他的《闲寂日记》中就有他拜访陈小翠谈诗论画的记载。后来知道施蛰存先生还先后用陈小翠和另一位女作家、画家赵清阁画印制成贺卡分赠好友,从中可感受到施蛰存先生极富生活情趣的另一面。

第一次见到施蛰存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还为此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。我是先去了华师大语言学家史存直教授家,门开的瞬间我就意识到我找错了门,施蛰存先生哪有那样长的胡须呀?好在史存直教授没有丝毫为难我就给了我施蛰存先生愚园路1018号住址。施蛰存先生和许杰、史存直三人曾一起由华师大召开祝贺执教六十年茶话会,同时退休并被聘为研究生导师。待见到施蛰存先生告知找错门一事,他大笑并对我说:“‘文革’期间,我被频繁地拉去批斗,后来才知道我大多是代替史存直的,因为小蒋们老是把我俩搞混了。”那次见面问他为何独独钟情翻译介绍东欧文学,施蛰存先生想了一下说:“我是受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的影响。东欧

文学的两个主旋律是农民问题和爱国主义,这正和中国当时的客观形势相一致。向国人广泛介绍东欧文学,就是要民众不做亡国奴,最终唤起全体民众抗日的决心。”以后他应我之请曾参加了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著作活动,分别捐了《北山集古录》和《花间新集》,有缘的是这两本书经公开拍卖最终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
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幸运,施蛰存先生还赠送我一页周作人为他法书的诗笺:“清逸先生百世师,通书读过愧无知。年来翻遍濂溪集,祇纸蓬窗夜雨诗。乙丑暮春写旧诗应施蛰存先生雅令 知堂。”从时间推算,诗笺系知堂老人出狱至上海,寓居横浜桥尤炳圻家时所写。周作人是施蛰存先生倾慕的文学前辈。1935年他为上海光明书局编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,曾专门周作人为封面题签。上世纪50年代,周作人遭人唾弃,落魄寂寞,施蛰存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与之书信往来,每赴京都亲往造访。对周作人、施蛰存先生在其《知堂遗述》短文中有如下评述:知堂老人的一生,是使人惋惜的,虽然在三十年代他和乃兄鲁迅的思想已南辕北辙,但他的人道主义和中庸主义,还是可以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。乃至附逆以后,身名大坏,使人有“脚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之感。可谓意味深长。

发挥余热的地方。让我有机会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。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:记得去年,我曾写了一份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言,其中一些自以为比较尖锐的话,在座谈会上发言时,我没敢说出来;不料,我的发言稿已送到那天到会的副市长赵雯手里,她在最后讲话时,把我写了却没说的话全都代我说出来了。

我母亲那时在馆里,经常有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机会,回家后总会很兴奋地谈她的见闻。现在文史馆的条件更好了,有了走出国门、与国外文化界交流的机会。去年11月,我也有机会去到意大利佛罗伦萨,访问了《即兴戏剧创作联盟》的同行们。从他们那里,我了解到了一种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型舞台表演形式——即兴戏剧:没有剧本,没有导演,没有演出前的

排练,根据临时出的命题,或者是观众临时出的题目,演员们只作几分钟的准备,确定环境、人物身份和规定情境,就上台即兴表演,像做即兴小品一样。甚至可以几组演员PK。这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,也很受观众喜欢。对我这个干了一辈子演员的人来说,这完全是很新鲜的事,非常开眼界。在法国的文化小城亚眠,我们还参观了那里的文化中心,这个只有15万居民的城市,文化中心里竟然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,邀请各国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团体去演出。

文史馆的气氛是宽松的、活跃的。今年3月8日,馆里为女馆员举行了妇女节联欢会,在会上,我为大家朗诵了《不老歌》。在几百岁以上的馆员面前,七十岁的我们,还真真是小妹妹呢!寿星相聚,有说不完的话。

201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8部作品,包括《晚春》《东京物语》《秋刀鱼之味》等,全是精品。能在大银幕看到这些电影,真是福气。我算是小津迷,十年前,小津百年诞辰,收过日本出的一个DVD套装,看过后,逢人便要推荐。以后只要是小津的影碟,都会买来珍藏。这些年来,我在早春时节,或者夏日午后,或者深秋季节,都要取出影碟温故知新。小津的电影,就像“茶泡饭之味”,简单,却又丰富;平淡,却又隽永。它们总能带给我一丝平静、温暖,甚至是淡淡的忧伤。

小津和黑泽明不一样,黑泽明的电影,每一部都迥然不同,几乎没有重复,而小津的电影,单看片名,就有点类似,比如用地名东京的:《东京合唱》《东京之女》《东京之宿》《东京物语》和《东京暮色》;用四时季节的:《晚春》《麦秋》《早春》《秋日》和《小早川家的秋天》。小津的电影是同一个主题——家庭的变奏,他翻来覆去讲述家庭里的故事:父母从乡下到大城市看望儿女,儿女是怎样子的态度(《东京物语》);女儿到了待嫁年龄,是嫁还是不嫁(《晚春》《麦秋》《彼岸花》《秋日》和《秋刀鱼之味》);夫妻之间出现了危机,究竟如何解决(《宗方姐妹》《茶泡饭之味》《早春》)……在小津展现的原汁原味生活细节里,我们好像触摸到了日常家庭所发生的一切,我们好像就是家庭成成员中的一分子,电影里的人,是我们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,我们一同哭,一同笑,一同悲,一同喜……

有人说,小津的电影过时了,可表现父母和子女关系的《户田家的兄妹》和《东京物语》,怎么看,里面的故事都觉得像是发生在现在。《户田家的兄妹》里,父亲去世后,母亲变得无家可归,先住在小儿子家,大儿媳宴请客人,嫌母亲碍眼要她外出回避;母亲转而住进大女

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还为此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。我是先去了华师大语言学家史存直教授家,门开的瞬间我就意识到我找错了门,施蛰存先生哪有那样长的胡须呀?好在史存直教授没有丝毫为难我就给了我施蛰存先生愚园路1018号住址。施蛰存先生和许杰、史存直三人曾一起由华师大召开祝贺执教六十年茶话会,同时退休并被聘为研究生导师。待见到施蛰存先生告知找错门一事,他大笑并对我说:“‘文革’期间,我被频繁地拉去批斗,后来才知道我大多是代替史存直的,因为小蒋们老是把我俩搞混了。”那次见面问他为何独独钟情翻译介绍东欧文学,施蛰存先生想了一下说:“我是受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的影响。东欧

文学的两个主旋律是农民问题和爱国主义,这正和中国当时的客观形势相一致。向国人广泛介绍东欧文学,就是要民众不做亡国奴,最终唤起全体民众抗日的决心。”以后他应我之请曾参加了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著作活动,分别捐了《北山集古录》和《花间新集》,有缘的是这两本书经公开拍卖最终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
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幸运,施蛰存先生还赠送我一页周作人为他法书的诗笺:“清逸先生百世师,通书读过愧无知。年来翻遍濂溪集,祇纸蓬窗夜雨诗。乙丑暮春写旧诗应施蛰存先生雅令 知堂。”从时间推算,诗笺系知堂老人出狱至上海,寓居横浜桥尤炳圻家时所写。周作人是施蛰存先生倾慕的文学前辈。1935年他为上海光明书局编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,曾专门周作人为封面题签。上世纪50年代,周作人遭人唾弃,落魄寂寞,施蛰存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与之书信往来,每赴京都亲往造访。对周作人、施蛰存先生在其《知堂遗述》短文中有如下评述:知堂老人的一生,是使人惋惜的,虽然在三十年代他和乃兄鲁迅的思想已南辕北辙,但他的人道主义和中庸主义,还是可以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。乃至附逆以后,身名大坏,使人有“脚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之感。可谓意味深长。

文学的两个主旋律是农民问题和爱国主义,这正和中国当时的客观形势相一致。向国人广泛介绍东欧文学,就是要民众不做亡国奴,最终唤起全体民众抗日的决心。”以后他应我之请曾参加了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著作活动,分别捐了《北山集古录》和《花间新集》,有缘的是这两本书经公开拍卖最终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
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幸运,施蛰存先生还赠送我一页周作人为他法书的诗笺:“清逸先生百世师,通书读过愧无知。年来翻遍濂溪集,祇纸蓬窗夜雨诗。乙丑暮春写旧诗应施蛰存先生雅令 知堂。”从时间推算,诗笺系知堂老人出狱至上海,寓居横浜桥尤炳圻家时所写。周作人是施蛰存先生倾慕的文学前辈。1935年他为上海光明书局编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,曾专门周作人为封面题签。上世纪50年代,周作人遭人唾弃,落魄寂寞,施蛰存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与之书信往来,每赴京都亲往造访。对周作人、施蛰存先生在其《知堂遗述》短文中有如下评述:知堂老人的一生,是使人惋惜的,虽然在三十年代他和乃兄鲁迅的思想已南辕北辙,但他的人道主义和中庸主义,还是可以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。乃至附逆以后,身名大坏,使人有“脚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之感。可谓意味深长。

发挥余热的地方。让我有机会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。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:记得去年,我曾写了一份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言,其中一些自以为比较尖锐的话,在座谈会上发言时,我没敢说出来;不料,我的发言稿已送到那天到会的副市长赵雯手里,她在最后讲话时,把我写了却没说的话全都代我说出来了。

我母亲那时在馆里,经常有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机会,回家后总会很兴奋地谈她的见闻。现在文史馆的条件更好了,有了走出国门、与国外文化界交流的机会。去年11月,我也有机会去到意大利佛罗伦萨,访问了《即兴戏剧创作联盟》的同行们。从他们那里,我了解到了一种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型舞台表演形式——即兴戏剧:没有剧本,没有导演,没有演出前的

排练,根据临时出的命题,或者是观众临时出的题目,演员们只作几分钟的准备,确定环境、人物身份和规定情境,就上台即兴表演,像做即兴小品一样。甚至可以几组演员PK。这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,也很受观众喜欢。对我这个干了一辈子演员的人来说,这完全是很新鲜的事,非常开眼界。在法国的文化小城亚眠,我们还参观了那里的文化中心,这个只有15万居民的城市,文化中心里竟然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,邀请各国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团体去演出。

文史馆的气氛是宽松的、活跃的。今年3月8日,馆里为女馆员举行了妇女节联欢会,在会上,我为大家朗诵了《不老歌》。在几百岁以上的馆员面前,七十岁的我们,还真真是小妹妹呢!寿星相聚,有说不完的话。

家,大女儿又借故母亲宠爱外孙影响学习,使母亲不得不借住在海边破旧的屋子;可笑的是二女儿明知母亲将住进破屋,还假模假样地说欢迎住进自己的家。《东京物语》里,父母到东京看望儿女,从小和气的儿子变得冷漠,原本温柔的女儿变得自私,他们把父母送进旅馆,唯有儿媳——死去儿子的遗孀还肯照料他们。母亲返乡后意外去世,办完丧事,子女又借口工作忙,匆匆来又匆匆去,只留下父亲孤独的身影。在现代社会,年轻人外出工作,空留老父老母独居故乡的情况,比比皆是,可年轻人在异乡成家立业后,哪里可以数典忘祖,哪里可以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!

小津的许多电影,着眼于父子、父女、母子、母女关系,表现父子关系的《我出生了,但……》《心血来潮》《东京之宿》《父亲在世时》,都令人动容。电影里的小孩子有时很任性:《东京合唱》里,父亲答应儿子买一辆单车,可因为父亲弄丢了工作,买不起单车,引得儿子发脾气;《早安》里,儿子们想让父亲买电视机,父亲嫌他们的话太多,儿子们居然从此不說話,以示抗议……最后,《东京合唱》里,父亲哪怕再没钱,也买来了单车;《早安》里,电视机终于进了家门——父亲原本想买的是洗衣机呀……看到这么温馨的一幕,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,小时候,我做的纸风筝挂在电线上,把弄堂里的路灯弄灭了,影响大家的生活,父亲撕烂了我的风筝。夜梦中,我痛惜我失去了的风筝。可哪里知道,第二天一早,我看见床头放着一只新风筝,这是父亲熬夜为我制作的。天底下的父母,不管是严厉的,还是慈祥的,他们对儿女,都是一样的,无私,无畏,总会满足儿女的愿望,而我们又是如何对待父母的呢?每念及此,心潮总难以平复。

文学的两个主旋律是农民问题和爱国主义,这正和中国当时的客观形势相一致。向国人广泛介绍东欧文学,就是要民众不做亡国奴,最终唤起全体民众抗日的决心。”以后他应我之请曾参加了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著作活动,分别捐了《北山集古录》和《花间新集》,有缘的是这两本书经公开拍卖最终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
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幸运,施蛰存先生还赠送我一页周作人为他法书的诗笺:“清逸先生百世师,通书读过愧无知。年来翻遍濂溪集,祇纸蓬窗夜雨诗。乙丑暮春写旧诗应施蛰存先生雅令 知堂。”从时间推算,诗笺系知堂老人出狱至上海,寓居横浜桥尤炳圻家时所写。周作人是施蛰存先生倾慕的文学前辈。1935年他为上海光明书局编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,曾专门周作人为封面题签。上世纪50年代,周作人遭人唾弃,落魄寂寞,施蛰存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与之书信往来,每赴京都亲往造访。对周作人、施蛰存先生在其《知堂遗述》短文中有如下评述:知堂老人的一生,是使人惋惜的,虽然在三十年代他和乃兄鲁迅的思想已南辕北辙,但他的人道主义和中庸主义,还是可以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。乃至附逆以后,身名大坏,使人有“脚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之感。可谓意味深长。

发挥余热的地方。让我有机会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。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:记得去年,我曾写了一份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言,其中一些自以为比较尖锐的话,在座谈会上发言时,我没敢说出来;不料,我的发言稿已送到那天到会的副市长赵雯手里,她在最后讲话时,把我写了却没说的话全都代我说出来了。

我母亲那时在馆里,经常有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机会,回家后总会很兴奋地谈她的见闻。现在文史馆的条件更好了,有了走出国门、与国外文化界交流的机会。去年11月,我也有机会去到意大利佛罗伦萨,访问了《即兴戏剧创作联盟》的同行们。从他们那里,我了解到了一种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型舞台表演形式——即兴戏剧:没有剧本,没有导演,没有演出前的

排练,根据临时出的命题,或者是观众临时出的题目,演员们只作几分钟的准备,确定环境、人物身份和规定情境,就上台即兴表演,像做即兴小品一样。甚至可以几组演员PK。这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,也很受观众喜欢。对我这个干了一辈子演员的人来说,这完全是很新鲜的事,非常开眼界。在法国的文化小城亚眠,我们还参观了那里的文化中心,这个只有15万居民的城市,文化中心里竟然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,邀请各国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团体去演出。

文史馆的气氛是宽松的、活跃的。今年3月8日,馆里为女馆员举行了妇女节联欢会,在会上,我为大家朗诵了《不老歌》。在几百岁以上的馆员面前,七十岁的我们,还真真是小妹妹呢!寿星相聚,有说不完的话。

发挥余热的地方。让我有机会对上海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。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:记得去年,我曾写了一份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言,其中一些自以为比较尖锐的话,在座谈会上发言时,我没敢说出来;不料,我的发言稿已送到那天到会的副市长赵雯手里,她在最后讲话时,把我写了却没说的话全都代我说出来了。

我母亲那时在馆里,经常有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机会,回家后总会很兴奋地谈她的见闻。现在文史馆的条件更好了,有了走出国门、与国外文化界交流的机会。去年11月,我也有机会去到意大利佛罗伦萨,访问了《即兴戏剧创作联盟》的同行们。从他们那里,我了解到了一种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型舞台表演形式——即兴戏剧:没有剧本,没有导演,没有演出前的

排练,根据临时出的命题,或者是观众临时出的题目,演员们只作几分钟的准备,确定环境、人物身份和规定情境,就上台即兴表演,像做即兴小品一样。甚至可以几组演员PK。这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,也很受观众喜欢。对我这个干了一辈子演员的人来说,这完全是很新鲜的事,非常开眼界。在法国的文化小城亚眠,我们还参观了那里的文化中心,这个只有15万居民的城市,文化中心里竟然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,邀请各国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团体去演出。

文史馆的气氛是宽松的、活跃的。今年3月8日,馆里为女馆员举行了妇女节联欢会,在会上,我为大家朗诵了《不老歌》。在几百岁以上的馆员面前,七十岁的我们,还真真是小妹妹呢!寿星相聚,有说不完的话。

## 海棠糕

彭瑞高

乡野行迹

记施蛰存先生

风景依稀似去年

书法

杨剑

